

《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序

杜 春 耕

《红楼梦》的流传,就其印刷形式来说,经历了手抄、木刻、石印、铅印四个阶段(其中的石印本还包括了两种影印本)。石印本的出版始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印刷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石印本刊出的早期,正好与地方政府把《红楼梦》当成淫书来查禁同步,故一开始发行,出版商就用数度改变书名的方法来与当局周旋,幸未出现大的问题。石印本的各种版本版式变化很大,印数亦极多,是《红楼梦》流传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仅一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就记载了二十种这类本子,笔者至二〇〇一年底为止,共收集到不同的石印本三十九种,其中《书录》未载的本子有二十一种,《书录》有而笔者未收集到的则有两种。据此估计,建国前曾经出版过的石印本,其总数应不少于六十种(以上数据均不包括删节本与影印本)。

木刻本是以不带批语的白文本及稍后由某一评家作评点的本子刷印的。而石印本没有白文本,且一直是以两家合评或三家合评的形式进行出版发行。按评家的不同组合,石印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书名为《增评补图石头记》或《大观琐录》的护花主人王雪香、大某山民姚燮的两家合评本;第二类是书名改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张新之、王雪香、姚燮的三家合评本;第三类是由蝶萝仙史评订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又名《警幻仙记》,它是由蝶萝仙史摘录改写的姚燮评与王雪香评两种评点本共同组

成的。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其即将陆续出版的《红楼梦》书系中,分别从上述三类本子中各选一种影印出版。它们分别是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刊行的《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刊行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求志斋出版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由于历来学人把主要精力均集中在研究早期抄本与萃文书屋刊印的程高木活字本上,关于石印本的论述极少而且不全面,因此研究的盲点很多,一般读者对此了解得就更少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有计划地整理影印出版《红楼梦》书系,必将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笔者作为一位《红楼梦》爱好及研究者,对出版社的这项重大举措深为赞许并表示感谢。

本文着重介绍、考证《红楼梦》石印本的源流。由于笔者水平及精力所限,能参考的资料又较少,故错误与阙失在所难免,敬请阅者原谅并批评指正。

首部《红楼梦》石印本印于光绪十年,出版者 不是“广百宋斋”而是“同文书局”

首部《红楼梦》石印本印于何年,海内外文章资料均说得相当含糊而不确切。起始资料均源于吴克岐的《忤玉楼丛书提要》,书中说:

《增评补图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上海广百宋斋排印本……清光绪间,广东徐雨之观察润,创广百宋斋于上海。铸铅字排印书籍,爰取家藏此本付印以公同好。纸墨精良,校对详审,世颇称之。后书贾仿印,改名《大观琐录》,脱误甚多。考《红楼梦》最流行世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评本,逮此

本出现而诸本几废矣。(页三十二)

吴克岐未注明《增评补图石头记》首刊于何年,又说此本为“广百宋斋”排印,故以后学界均称此本为“广百宋斋本”,而且是铅印的。后一粟收集到一部光绪十二年刊印的《大观琐录》。由于《大观琐录》即为此本,只不过书名因为躲避书禁而改变,故推测《增评补图石头记》应首印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前后。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以上的不清不楚的说法得到了纠正。数年前,笔者在一个拍卖会上购得一部书品几乎全新,且每叶内均加衬纸的原装《增评补图石头记》,共四函计二十四册。此书的一切细微之处均与被称为“广百宋斋本”的那部书一致。不同处有二,其一所有“广百宋斋本”未有考究到每叶内均加衬纸;其二“广百宋斋本”的扉页为两行大字:“增评补图石头记”,反面为一空白白纸,而此本的扉页反面却印着“光绪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三行手写体大字。有了这个实物证据,延续了八十余年的吴克岐之有误的介绍就必须纠正了。这一物证说明:

(一)《增评补图石头记》初版不是由“广百宋斋”出版的,而是由“同文书局”刊印的。

(二)出版的时间可确定为光绪十年冬天的第一个月(孟冬)。

(三)此书为石印本,而不是“铅印本”。

此书的底本为徐润所有,所标“悼红轩原本”是否为底本原有还是为了商业效果而后加上的已不可考。下面介绍一下徐润与“同文书局”、“广百宋斋”的关系,这样读者或许可以悟出吴克岐为什么会那样介绍此本的原因。

《清徐润雨之先生自叙年谱》(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记录了石印书籍在我国最初出版刊行的情况:

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

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页六十)

《年谱》还叙述了刊印首部《红楼梦》石印本的同文书局的创办经过及停办时间:

从第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余力赞成并附股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起,招商局招股百万。是年招足,议再招百万股,共银二百万两……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一八九二)开办《甲午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遂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停办。(页六十一至六十二)

另外,在《年谱》的孙世馥序中,还讲到“广百宋斋”亦是徐润或以徐润为主创办的:

(雨翁)又与诸昆季创同文书局,奉旨印《图书集成》进呈御览。余如广百宋斋铅版书局……或合开或独创难以枚举。

在《年谱》中,徐润还自道“广百宋斋”铅印《石头记》的事实与时间:

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四十八岁。广百宋斋经理王哲夫先生并朱岳生、许幼壮以钢版铅版《选辑批雍正手谕》……《绘图三国演义》、《聊斋》、《水浒》、《石头记》及缩本《康熙字典》分售于上海。(页八十一)

至此首部石印《红楼梦》的出版经过已搞清楚了。光绪十年，同文书局用铅字排了《增评补图石头记》，后来用照相制版方法，制版于石头上，用石印法使之面世。但由于书禁的原因，印有出版时间及印制书局名称的本子没有（或基本没有）上市（笔者所得之本极可能是书局自留的样书）。第二年，广百宋斋铅印书局撤去了版权页，用铅印的方式出版了该书，即是如今传世较多为藏书家们所偏爱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本。首部石印《红楼梦》，记录了西方印刷技术进入我国后，早期的铅印、石印混用的印刷历史，亦反映出《红楼梦》一书在光绪时代流传的坎坷历程。细辨光绪十年同文书局本与光绪十一年广百宋斋本，似乎还能看得出用两种不同印刷技术印出来的书之间的微小差别，后者似乎墨式均要深于前者（各本皆如此）。经与冯其庸、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张庆善诸先生讨论，大家认为把同文书局本称为“铅排石印”比较合适。

《大观琐录》即是《增评补图石头记》

从光绪十年同文书局版《增评补图石头记》，演变到版权页空白的广百宋斋本，撤去版权页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是为了对付查禁“淫书”。当把两种版式的《大观琐录》放在眼前时，我们就可说上面的判断一定是事实了。

一粟《红楼梦书录》记载了一部《大观琐录》，介绍中指出：

光绪十二年铅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增评绘图大观琐录”，背面题“光绪十有二年六月校印”。与广百宋斋本全同，但缺大观园图……除绣像及回目画各页外，中缝“增评补图石头记”字样均已涂去。（页五十八）

除一粟工作所用本外,笔者还同时收集到一部半与此本基本全同,但又有明显差别的《大观琐录》(此次影印即以此本为底本)。此本与一粟工作本相比,不缺大观园图(估计那套书中的图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但撤去了版权页上的“光绪十有二年校印”字样,并以手工方法用油墨一一涂去绣像及回目画页中缝之“增评补图石头记”字样。可能由于时间匆忙油墨涂得很不一致,有许多页由于油墨用得过多,以致于向四周渗透很严重。个别墨浅处,则尚可隐约看出底部原印有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字样。拿相同的半套另本与全套的相比,相同画面的中缝所涂的油墨深浅位置亦均不相同。笔者及同好们均未见过有类似现象的书籍,亦未见过有这一类记载。故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实物资料,从中仿佛可以看到书商们为了赚钱不得不冒点风险的紧张场面,颇有戏剧色彩。另外,《大观琐录》本还把《增评补图石头记》本中,每回回首所印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卷××”,改印成“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卷××”。把“大观”本与“增评”本的任何相同一页迭在一起,在灯光下照看,除上述差异外,它们是分毫不差的。《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就是《增评补图石头记》。

此次出版社选择底本时,之所以不用光绪十年本而用《大观琐录》本,其原因有二。其一,两本其实全同,但读者基本上未见过“大观”本;其二是,《大观琐录》所遗留的版本现象有价值且极为罕见。另外,《大观琐录》底本中,原有某“楚北女史范薇浣仙”小心地夹贴在其中的咏红诗七首,她贴的技术很高,用的纸色又和原书近似,乍看还以为是书中原有的。故此次出版一并印出。

《大观琐录》本(即《增评补图石头记》),在该书的总目结束处,印有两行日文,为:

ケイケイキョウサウ
ゲンワヨウシエンケイ

同校

这两行字，很像人的名字，这也许是外国人参与《红楼梦》版本确定工作的较早记录。笔者请教了水户理化株式会社的三位日本朋友，他们中的两位已是老人，读后均说现在日本已不用这样的文字了，是不是人名也说不准。故此对那两行文字的解释只能存疑。随后，其中的一位日本人，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我日本人也爱红楼梦”九个大字并落款盖章后赠我，这亦算是一段佳话罢。

三家评《金玉缘》本之首刊应在光绪十四年或十五年

一粟所著《红楼梦书录》在介绍这类评本时，所录的最早版本为在版权页上印有“光绪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字样的本子。而上面介绍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则刊印于同一年的“孟冬”。按“孟冬”、“仲冬”、“季冬”分别表示为冬天的三个阶段的习惯用法，那么《金玉缘》的首刊时间仅比第一部石印本晚一个月左右，且均诞生在同文书局。由于笔者未见到过此本，故对此本之具体状况无法细考。但据《书录》所言，该书书首写序的作者与所有《金玉缘》本一样为“华阳仙裔”，并标明写序时间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小阳月望日。”写序的时间晚于该书刊出时间近四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为序言标错写序之时间；其二为由于某种原因（例如逃避书禁），故意填早了出版时间。窃以为，对此本《金玉缘》来说其原因只能属于第二种，因为在另外三个早期《金玉缘》本（“戊子仲冬沪上石印”本、“己丑仲夏沪上石印”本、“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中，书首的序言同样是“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华阳仙裔识”。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最同情的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用宝玉与宝钗之间的“金玉姻缘”来作全书书名是不合适的，故我们只能理解成书名的改动与躲避查禁淫书之举有关。

上述四种本子,正文、评点与卷首所收各种附文均相同,前三种的绣像均为一百二十页,书页背面为人物绣像而次页的正面为该像的图赞,是《红楼梦》刻印本中绣像最多的一类本子。而光绪十五年的同文本,绣像已改为四十二页,画面亦不相同(另一种同文本,则部分缩小绣像,一页书中含四幅带咏的绣像,故仅十五页,但版权页同为“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基于上述情形,此次影印之底本,出版社决定采用“己丑仲夏沪上石印”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蝶梦仙史评订之《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与《警幻仙记》

在总共分为三类的石印本中,蝶梦仙史评订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是刊印版式最多,现今存世数量亦最多的本子,但它又是一类人们几乎未研究过的本子。时至今日,我们并不知道蝶梦仙史的真实姓名和有关生平;也不能确切地说出该类书首刊于何时;甚至连蝶梦仙史到底“评订”了什么也未见过有人作出确切的说明。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笔者说不出任何情况,第三个问题将在本文“三类本子评语的分辨”一节中作分析,现在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一粟《红楼梦书录》记录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的最早版本,为“光绪丙午菊秋月上海桐荫轩石印”本。丙午为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现在学人均把《书录》所载的这一年份定为蝶梦仙史本的初版时间,但这实际上是一件大可商量的事情。

熟悉《红楼梦》各种版本的人都知道,该书的出版过程有一个普遍的规律且极少例外。即某种类型的本子,在推出之初总是印得比较考究,而且每面正文的行数与每行所含的字数相对较少。而同一类型的本子,当再出其它版式时,每面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就会逐渐增加。例如,“东观阁本”的初版为每面十行,每行二十

二字；而到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印的本子，则变成了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再晚一点发展到三让堂系列时，则正文变成了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七至二十八字左右。又如《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十年本为每面十四行，每行三十一字；而到光绪十八年的“古越诵芬阁藏板”本，则每面变成了十五行，每行变成了四十字；到光绪二十四年的“光绪戊戌季夏上海石印”本，则又演变成每面十六行，每行四十字；三家评本的《金玉缘》也不例外。

对蝶萝仙史评订本来说，情况亦是一样的。如光绪三十二年的桐荫轩本为每面二十一行，每行四十字，而“光绪戊申年七月上海求志斋石印本”，时间晚了两年，行数变成了每面二十二行，每行四十四字；到了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则变成每面二十六行，每行五十六字了。所以一般来说，熟悉古籍的人大多用这一方法来判断版本的早晚（因许多版本是不标出版年月的）。笔者手头有三组区别明显的蝶萝仙史评订本的残本，均为每面二十行，每行四十字。由于均缺版权页，故不知道它们印于何年。其中两组的版式与桐荫轩本类似，另一组则与“求志斋本”较近似，均有花边印在正文四周，但花纹图案则两者全不相同。这三组残本中，有一组可确定为民国时期的印本，因为该书的封面笺条上印有一幅极似梅兰芳饰演黛玉葬花的小图案，而梅兰芳演此剧已是二十年代的事了，这个本子笔者估计为旧版重刷本。这些本子的存在说明，极有可能光绪三十二年并不是蝶萝仙史本首印的时间，初版的时期或许还应该早几年。桐荫轩本仅仅是我们现在已见到的最早带年号的这类本子而已。

在仔细翻阅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带花纹图案的残本时，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证明《红楼梦》一度曾被人称为“警幻仙记”而且出版过。这一残本仅一册，为一百零七回至一百十二回，其中有四回的回首印有“增批石头记图咏卷×××”字样，而其中的一回则印着“增批警幻仙记图说卷一百十一回”。这一发现，使《红

《红楼梦》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用过的书名由八个增加成了九个。

三类本子的正文文本

从笔者个人收集到的有关文献来看,似乎没有人讨论过这三类本子的文本分类问题。现将个人所作判断作一介绍,错误之处望阅者指出。

本文所讨论的三类本子之文本,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类。《增评补图石头记》与蝶梦仙史评订本为一类;三家评《金玉缘》为另一类。但它们都是萃文书屋程甲本系统的本子,差别不大。《增评补图石头记》之底本,书中印有“悼红轩原本”字样。这几个字到底是同文书局所据底本原有的,还是书局为吸引读者而后加上去的,已不可考,但它不会是从曹雪芹的书斋悼红轩中流传出来的,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个本子与程甲本确实是有差别的。吴克岐在《犬窝谭红》之“红楼梦正误”自序中说:

《红楼梦》版本极多,亦大同小异,至徐氏本出(即广百宋斋排印,署名“增评补图石头记”),坊贾争先翻印,视为定本,实则徐氏本仅就浅显处稍加修饰,其重要误点仍然存在也。(转引自《红楼梦书录》页二百零四)

吴克岐所言是正确的,现举文本之一例说明之。在第三回接近末尾处,大多数本子(除此本、双清仙馆本、蝶梦仙史评订本以外)在讲到贾母为林黛玉添丫头时,均这样写道:

(贾母)料黛玉皆不遂心,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的与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

但《增评补图石头记》则按照双清仙馆本，把贾母给黛玉的丫头改成了两个：

（贾母）料黛玉皆不遂心，将自己身边两个丫头，名唤紫鹃、鹦哥的与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

由于《红楼梦》的抄本与程高本中，贾母给黛玉的丫头均写明为“鹦哥”一人，故读者在看到后几回书中，黛玉身边多出来了一个紫鹃，同时又不见了鹦哥时总觉得奇怪。《增评补图石头记》等三种本子虽用增加贾母给黛玉的丫头数量暂时来解决问题，但在第二十九回、九十七回、一百回中，鹦哥又在贾母身边出现了。《红楼梦》中许多矛盾是由于雪芹“书未成”而造成的，因此这些矛盾是系统的和交错的，除非重写一本《红楼梦》，否则有些矛盾仅用修补方法来克服是不可能的。

由于蝶萝仙史评订本基本上是广百宋斋本的整理本，它在摘录改写其母本评语的同时，亦继承了正文文本，所以两本是一致的。

而三家评本是以卧云山馆本中的张新之评作为其主干的，因此它的正文亦继承了该本的文本。这是两类文本的来源。

三类本子评语的分辨

许多读者常常搞不清楚《增评补图石头记》（即《大观琐录》）、三家评《金玉缘》、蝶萝仙史评订《金玉缘图说》三类本子中的大量双行小字评、行侧评、眉评、回后总评等各为哪位评家的评点，从而影响到阅读和研究。现在此特别作简要的说明。

（一）《增评补图石头记》

此书为护花主人王希廉雪香与大某山民姚燮二人的合评本，

故俗称“二家评本”。王雪香的评首刊于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俗称“双清仙馆本”)。双清仙馆本为王雪香一个人的评本,评语全部集中在每回回末正文之后,是以“回末总评”的形式出现的。“二家评本”全文转录了王评,同样把这些评印在每回正文后面,且在评前冠以“护花主人评曰”字样,十分好认。

大某山民姚燮的评在此书中首刊,共分三个部分。其一为“回后总评”,印在王雪香评语后面,评前用一行“大某山民评曰”的文字与王评分开,但这类评并非每一回书都有的;其二为眉评,印在正文上部的天头上,数量十分多;其三为印在正文右侧的行侧小字评,数量亦十分可观。

(二)三家评《金玉缘》

此书为张新之评、王雪香评与姚燮评的总集,以张新之评为重点。评点只有回后总评与夹在正文中间的双行小字评两类,没有眉评。其中张新之评与王雪香评是全文转录,而大某山民姚燮评则仅保留了回后总评部分,他的眉评与双行小字评已被全部删去。其回后总评按张新之评、王雪香评与大某山民评的次序排列。正文中的双行小字评为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湖南卧云山馆刊印的《绣像石头记红楼梦》的评的全文转录,没有掺杂姚评在内。此书虽称为三家评本,但其评语总数反不及二家评本多,原因是姚评的量要比张新之的评多许多。

(三)蝶萝仙史评订《金玉缘图说》

与三家评本一样,此本亦无眉批,仅有回后总评与正文双行小字批两类。其回后总评刊印时未标明为何人作评,但实际上仅是王雪香一人评语的转录,没有其它文字掺杂于内。书中夹在正文中的双行小字批源于姚燮一人的眉批与双行小字批,但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重新组合并作了大量的删节。时至今日,大家均未找到任何资料来考证蝶萝仙史的真名实姓,他所做的“评订”工作或

许仅是删节与改编组合而已。此类本子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印得极多，版式亦五花八门，原因是它符合读者与出版商双方的要求和利益。大量的读者其实并不要看过多的评语，出版商则可以以此降低印书成本，扩大销售。

《大观园影事十二咏》的作者是林则徐

《增评补图石头记》、三家评《金玉缘》、蝶萝仙史评订《金玉缘图说》三类石印本，在卷首部分均收有“大观园影事十二咏”一项，由“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湘云眠石”、“宝琴立雪”、“晴雯补裘”、“小红遗帕”、“藕官焚纸”、“玉钏尝羹”、“龄官画蔷”、“香菱斗草”、“平儿藏发”、“莺儿结络”共十二组七言诗组成。但所有本子均未标明这些诗的作者是谁，《忤玉楼丛书提要》亦说“大观园影事十二咏，不知何人所作”。很巧，笔者藏有一幅林则徐手书扇面（原件），很工整地用小楷写有十二首咏红诗，落款为“少穆林则徐”，并加盖一刻有“少穆”二字的阳文印鉴，题款为“×××大人雅属”，其中“×××”三字已用刀子刮去，想是此“大人”的后代在出让此扇面时有意所为。在一次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红楼梦成书过程研讨会”上，大家一起对此扇面作了鉴定，一致认为应是真品。当笔者将此扇面复印件若干份赠送同好后，红学会秘书长杜景华先生首先发现，扇面中的十一首诗与“十二咏”所收之诗相同（极个别字有出入），只是扇面诗缺最后一首“莺儿结络”，而在最前面多出来一首“黛玉葬花”诗。现把扇面中多出来的诗抄录于下：

娇弱飘零感此身， 一锄烟雨葬残春，
观空色色花如团， 埋玉深深未了因。
收拾珍珠诗外泪， 扫除藩溷鬓连尘，

曲中不尽芳编蓝，宁独红楼绝世人。

林则徐题写的扇面诗未写是引自何人的诗句，故应认为即是他本人所作。另外，扇面诗中“宁独红楼绝世人”一句中的“宁”字未避道光皇帝讳（在道光朝“宁”应写成“甯”），故可知此扇面书写于嘉庆时代。林则徐为嘉庆十六年（一八一—）进士，此诗风格活泼清新，没有过来人的沉重气息，与林则徐当时的年龄与年轻有为的气质相合。

扇面诗的次序排列与印本亦有小异，这倒符合《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编定者的风格。他们是会自作主张改动一些东西的，如本文后面将要谈及的把东观阁的评语也编入大某山民之评，把兰卿（兰皋居士）对姜祺《红楼梦诗》的八十条评语当作“大某山民总评”印于卷首等等。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被贬，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同文书局在收入这十二组诗时故意不写出作者的名字。《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亦是终结，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的第一人，这“十二咏”把两者结合到了一起，是很有意义的。

“东观阁本评语”、“兰皋居士评语” 混入大某山民正文评、总评之说明

《增评补图石头记》与三家评《金玉缘》两种本子的卷首，均印有“大某山民总评”，共收入评语八十条。洪克夷先生在他的《姚燮评传》中指出，这八十条评的作者不是姚燮而是兰卿（兰皋居士），他说：这八十条的所谓“总评”，估计是姚燮参阅姜祺《红楼梦诗》时抄录在《红楼梦》书上的。后人不知前此有姜祺的诗和旁批，遂将它们与姚燮的其他批语一齐署上了“大某山民”的大号

……按姜祺诗的旁批,作者“兰卿”。《读红楼梦纲领》“诸家撰述提要”一节中说“(姜祺诗)词甚卑浅,不足讽也。其有旁批论断者,系兰卿氏笔,多有可采。”可证姚燮本人倒无意冒名顶替,将那些批语占为己有。(页一四六至一四七)

为了慎重起见,笔者用道光甲申序版《姜祺·红楼梦诗》刻本与“大某山民总评”作了一一对校,说明洪先生说的确是事实。“大某山民总评”大部分即为兰皋居士对姜祺诗所作的评,亦有一部分则为姚燮读了兰皋居士批后表示赞同的随笔,现各举一例说明之。

(一)“大某山民总评”第二十四条之全文为“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兰皋居士对姜祺秦可卿诗的双行小字评亦为“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一字不差。

(二)“大某山民总评”第七条为“指袭人为妖奴,李嬷嬷自是识人。”姜祺的李嬷嬷诗为“阿姥喧奴怎不平,郎君相待太相轻。只因牛乳偿人乳,掀起妖妇吸髓情。”兰皋居士之双行小字评为“妖妇袭人也。”这是“总评”中姚燮读姜诗兰皋居士评后,摘句而写的随笔,属有较大变形之评,但还是出自于兰卿之评。

不仅如此,《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编辑们还把大量东观阁本之评语亦分别编入姚燮的眉批、行侧批及回后批之中(有学人作一统计,其数量占东观阁本批语的九成左右),造成不少人以为姚燮在大量抄袭东观阁评当作自己之评。这实是一种误解,笔者以为有必要为大某山民洗清这个不白之冤。

姚燮是个著作等身的高产学人,他除了有许多专著以外,尚有一个爱在他所读的书作即兴笔记和写随笔的习惯。他的批点是一种兴趣,不一定是为了刻印出版,故并未做细致的整理、归纳工作。读一下《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姚批即可知道,姚燮批点《红楼梦》所用的本子是一部东观阁系统的本子。他在作个人的大量评批时,亦偶尔对印在书上的小字东观阁评提出一些看法。但他不

会亦不可能把数千条东观阁批(这个数量远远小于姚燮自己的批)重抄一遍在本子上,这个工作一无必要;二不符合读书人作批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是刻本周边及行间所留空间本来就很小,要写下姚燮自己的批已十分困难,他怎么会再去抄一遍数量亦很可观的东观阁批呢?《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把数量很多的东观阁批纳入姚燮名下,那是编辑们干的,他们不仅收了东观阁批,而且还把它与姚批一起做了整理归类。姚燮不是一个侵占别人知识产权的抄袭者。望读者注意,不要产生误会。

石印本绣像之错误考

据一粟《红楼梦书录》中记载,光绪三十四年求不负斋石印本《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民国十四年上海石印本《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光绪三十二年上海桐荫轩石印本《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这三本书均有大量图赞错乱的现象存在。笔者为验证这一记载,校对了多部石印本绣像中的图与赞,发现这一现象远远比《书录》所记的严重。故下了一点笨工夫寻找其出错的原因,后来发现这些错误是有规律的,其造成错误的原因亦可以说明。现把这一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一)“己丑仲夏沪上石印”之《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绣像是仿照光绪八年点石斋石印出版的王云阶绘《增刻红楼梦图咏》而作。除第一页的“石头”与第十五页的“元春像”与王云阶画全异外,其余均大同小异,但画面线条不如王本生动有力。

(二)“己丑仲夏沪上石印本”中的一百二十幅绣像的赞文取自姜祺的《红楼梦诗》,但姜诗中不存在的人物之赞估计另有所本。

(三)“己丑仲夏沪上石印本”中的绣像已有三幅发生了图与赞不相匹配的现象。它们分别是页二十八、页二十九、页三十。原

因很简单,这三页的正面所印之赞应该分别是对应李绮、巧姐与薛姨妈三个人物。但由于编辑工作的疏忽,把李绮前面一个人物李纹的赞印了两次,即李绮之赞与李纹之赞在这部书中文字是相同的(但字体不同)。这样的错乱延续了三个人物,即李绮的赞用了李纹的赞;后面的人物巧姐之赞则用了李绮之赞;而下一个人物薛姨妈的赞则又用了巧姐的赞。

其它诸本出现的错误,均是由于没有看到“己丑仲夏沪上石印”本的绣像与赞的相互错位而造成的。在“己丑仲夏”本中,每页的反面为绣像,而次一页的正面为前一页反面所绘人物的赞。但编辑工作时经常看到的是没有折叠的展开的书页。在每一个印页中,左边印了一幅人物绣像,而右边印一个人物的诗赞。但这一像一赞不是相对应的,左边所印人物绣像的赞是印在下一书页的右边的;而右边所印的赞则应与上一页左边相应的绣像人物相对应。但后来再出的不少本子的编辑们,以为同一书页中的一像一赞是相互对应的,在制作新本子时便出现了每个绣像与赞对不上的错误。对这样的现象,读者只要把下一幅绣像的赞去对应上一页的绣像就能正确地复原了。

这么多本子都出现了错误,说明出版这些书的书局的编辑们水平是很低的。其实他们只要能读懂赞的含义,那么就不会盲目地犯一系列的错误了。

书名与禁书

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知从石印本出现以来《红楼梦》又多出了三个书名。现在来看一看整个书名演变的历程。

在曹雪芹尚未去世之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中,已记录了它的五个曾经用过的书名,即①石头记;②情僧录;③红楼梦;④风月宝鉴;⑤金陵十二钗。

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博览会》第三集中,收有野鹤著的“读红楼梦札记”一文,记有《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情界真诠》,这是该书的第六个书名,可惜我们没有看见过此书,文中写道: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又名《金陵十二钗》、又名《风月宝鉴》、又名《情僧录》、又名《情界真诠》,都未尽善。盖此书千门万户,千头万绪,挈领提纲自非易事。(《小说博览会》页六十三)

这些书名,按野鹤的分析均是从书的内容中提炼出来的。但《大观琐录》、《金玉缘》两个名字则是书商与政府斗法的结果,其名字不能包涵全书宗旨(《警幻仙记》书名为何出,无资料可以说明)。尤其后一个书名《金玉缘》,似乎与作者的主导观点相距甚远。《红楼梦》悲剧的核心为宝玉、黛玉的“木石前盟”,是宝玉在情爱领域中的至深追求。“金玉缘”是宝玉与宝钗身上的两个饰物所象征的缘分,但双方似都不是十分刻意地去追求。《金玉缘》的书名一现,尚未看过这书的读者容易以为此书主要是讲宝玉与宝钗的爱情故事,似乎不大合适。但奇怪的是,最基层的读者欢迎这个名字的特别多,许多民间艺术作品似乎已不管《红楼梦》一书的基本情节,已把“金玉缘”和宝玉、黛玉的爱情联在一起。有许多取名为“金玉良缘”的年画和刻在瓷器上的画,图中的青年男女不是金玉的主人宝钗、宝玉,而变成了宝玉和黛玉成双成对幸福地配在一起。学者们歌颂《红楼梦》的悲剧结尾,分析出它的深刻思想意义和艺术魅力。但老百姓在为宝、黛流泪的同时,更向往着“愿天下有情人都有了眷属”。《金玉缘》绣像的首页正面就印着这十一个大字。这里不存在审美观念高下与思想是否深刻的问题,而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那时的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尤其在情感领域。这也就难怪那些被称为“狗尾续貂”的大量以宝黛有

美满结局的续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有极大的销售量。现在尚保留下来的这类早期续书的数量,大约可占《红楼梦》本子的四分之一左右。和原著相比,续书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境界、格调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个人以为也不要骂得太过火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

说了以上一堆题外话,目的是想谈一下,《红楼梦》一书实际上是获得了上至王公贵族、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基层民众的一致的欢迎的,《红楼梦》从来没有和“文字狱”联系在一起过。虽然正文中有“不敢干涉朝廷”等胆战心惊的文字存在;又有被打倒的皇室子弟弘晔所写的“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的批语。实际上是爱且怕的一种表现。弘晔在永忠的“弔雪芹三绝句”上作批,实际上是他喜欢《红楼梦》的一种直接证明。

我们再看看故宫长春宫有不少红楼梦壁画,长廊画中亦有若干是描述《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的;《红楼梦》的本子流入民间,其中一个渠道是苏大司寇家的书被鼠咬了;《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存在则证明怡亲王府抄录了此书;林则徐为《红楼梦》写了“大观园影事十二咏”;主考官雁隅购抄本两部“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闱中传为佳话”;后来曾为禁淫书出过大力的丁日昌,年轻时为二百首题红诗逐一作评作序,推崇备至……这一切切实已表明《红楼梦》的大量欣赏者是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和最上层。这些人为了维护与巩固统治地位,他们不让老百姓从封建伦理道德中有所开放,但他们自身却在要求另外一类真实而有情感的东西。我想他们对于《红楼梦》这样有情有性有悟地客观描述整个时代社会面貌的作品,其欣赏程度不会亚于民众(当然他们从中悟出来的味道可能不同)。这真像林彪、“四人帮”的时代,让老百姓只能读红宝书和看八个样板戏,而他们自己则在安乐窝里大看西方的影片并津津乐道。

有了这样的背景,所以书商只要改改书名,涂涂有关文字就可以使此书仍然大量发行。徐润与曾国藩和李鸿章均有密切的关系,徐润的两个书局在印制此书,难道中堂大人会一点不知情吗?徐润印了书说不定他们还会去要呢!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日报》上,有《红楼梦讼案》一文,记载了有人告发万选书局石印了二千五百部《金玉缘》,并已售出一事(详见《红楼梦书录》页六十三),但查来查去最后以“不了了之”告终,没有治任何人的罪。由此可见官吏们对禁淫书一事的敷衍态度。《红楼梦》与文字狱毫无关系,文字狱是针对直接威胁皇帝或要反清复明的“反革命”的。把《红楼梦》及其续书包括在众多“淫书”之内,爱红者(如丁日昌之流)举起禁红律令,执法者推委塞责,贩红者小动手脚蒙混过关。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石印本之易名与流传过程的风风雨雨,则是另一出好戏。

至于像毛庆臻、梁恭辰之大肆毁谤《红楼梦》与曹雪芹的道学先生之说,是历来有之,不足为凭的。

以上十部分文字,其实只可算“杂谈”及“杂考”,笔者之能力亦只可至此。最后要感谢出版社殷梦霞女士和于浩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四日

于北京天通苑